

转入与转出：早川书房译介中国 当代科幻文学的行动路径^①

卢冬丽 强宇铭 卢一平



【摘要】早川书房是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日本译介生成的核心行动者。本研究通过分析早川书房的译介历程和译介行为发现：出版社借助资本互动，通过“转入”和“转出”两大行为路径，构建起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日本翻译生产、流通与批评的行动网络。早川书房积极将英日科幻文学译者“转入”翻译生产网络，在译者选择、译者合作模式的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将翻译标准“转出”为译者行动者的实践准则。另外，早川书房将书店、媒体等行动者“转入”宣传销售行动网络，形成“磁力场”，引发对中国科幻的集束性关注，进而将专业评论人、精英读者等行动者隐性“转入”翻译批评网络，推动中国科幻在日本的批评话语体系构建。本研究厘清了出版社行动者在海外文学译介生成中的核心作用，为中国文学外译的核心行动者研究提供了参照。

【关键词】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早川书房；转译；行动者；网络

1. 引言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具有中国文化构建的力量。其中，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基因，以独特的中国式叙事为现实提供新的表现路径，既观照当下的中国现实社会，也反思全球人类面临的境遇，实现了从文学向文化与思想的价值转化（许钧，2021），并以动态多元的方式建构人类新的存在意义。中国科幻文学已然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① 本文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自设课题“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研究”项目资助；受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十四五”规划专项课题“高校教师文学文化外译‘实践—教学—研究’的三维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12792JS）的项目资助。

的新名片”(姚建彬,2018:11)。2020年,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将科幻文学的发展与对外传播提升至新的高度。在当前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译介生成过程中,“商业出版机构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文学国际推介的主力”(汪宝荣,2020:41)。但是,目前相关研究“尚缺乏适用的理论及分析工具”(汪宝荣,2020:41),以商业出版机构为代表的接受语境社会行为人研究一直被学界所忽视”。尽管有学者(汪宝荣,2020;刘毅,2021)聚焦西方商业出版社,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社会实践论勾勒其在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中的行动模式,但是尚无学者对日本商业出版社译介中国文学的活动进行深入探讨。

2. 行动网络的分析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认为,社会“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异质性元素之间的联系”,主张“通过重构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来揭示社会的本来面目”(Latour,2005:8)。该理论提出三大核心概念:“行动者”(actor)、“网络”(network)和“转译”(translation)。(Latour,2005:30)行动者存在于网络之中,与网络互为构建,通过转译推动网络的流动与变化。具体来说,翻译“行动者”即做出翻译行动或介入翻译行动过程且受其影响的人或事务,包括人类行动者(human actors)和非人类行动者(non-human actors),各行动者自由联结,会主动转换、翻译,甚至扭曲、修改原本所应传送的含义或元素。(Latour,2005:39)翻译“网络”即翻译行动中具有能动性的翻译相关行动者,在互动联结中形成的开放的、流动的且具有自我解释性的动态痕迹。此处的“转译”与下文提及的经由英语中介发生在“中—英—日”3种语言间的翻译现象不同,它指不同翻译行动者通过协商、调解,促使行动者之间建立联系并推动翻译网络的运行过程。布泽林则认为,“‘转译’是行动者征召其他行动者时所采用的方法”,一方面“行动者们通过‘转译’将自身目的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语言”,另一方面“并将其他行动者招募到自己的活动中(或在必要时解散某些行动者),从而确保目标达成”。(邢杰等,2019:31)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及布泽林关于“转译”行为的描述,本文将翻译界定为由各相关行动者所构成的译介生成性行为,并将核心行动者的“转译”行为具体划分为“转入”行为和“转出”行为。由于行动者之间存在信息沟通是否顺畅、目的是否趋同等差异,这些行为整体可能呈现连续、一贯的状态,也可能表现为断裂、隔层的状态。资本占有量多且主体目的性强的行动者,会积极构建连续且高效的“转入—转出”行为链,以显性或隐性方式招募各行动者,组建活跃的行动网络。由此,本文聚焦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日本译介生成过程中的非人类核心行动者——早川书房,构建出版社在翻译行动网络中“转入—转出”的译介行为分析框架。其中,“转入”指早川书房将其他行动者招募至行动网络的译介生成行为,

“转出”指其将自身目的转换至其他行动者语言的译介生成行为。上述行为以早川书房为关键节点,联结成动态的译介生成网络。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梳理早川书房译介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活动历程,追踪其在翻译生产、出版流通与话语批评三大方面的“转入—转出”行动网络,描绘各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和行为规律,依据动态网络进行自我阐释与重构,剖析海外商业出版社的核心生成力,为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生成中的关键行动者研究提供参照。

3. 早川书房译介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活动历程

3.1 早川书房译介海外科幻文学的历程

早川书房由早川清于1945年创建,是日本成立时间最早、专业性最强的通俗文学出版社,在科幻文学、推理文学领域独占鳌头。现任社长早川浩于1965年开始主管国际版权部,策划引进了诸多海外名作,如《大白鲨》(*Jaws*)、《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Flowers for Algernon*)和《早秋》(*Early Autumn*)等。在担任总裁期间,早川浩又将《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等经典作品引入日本图书市场,其中《桥头眺望》(*A View from the Bridge*)和《教父》(*The Godfather*)更创下在日热销超百万册的纪录。1998年因在日本译介海外推理小说方面的成就,早川浩被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ystery Writers of America)授予埃勒里·奎恩奖(Ellery Queen Award)。另外,在2022年4月举办的伦敦书展上,早川浩荣获终身成就奖。以早川浩为代表的早川书房,凭借其出版精神和出版业绩在国际出版界获得了高度认可。

笔者根据早川书房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统计,至2022年4月底,该出版社共出版著作3625部(不含作品集),其中科幻文学、推理文学类共计2727部,占比高达75%。早川书房自1957年起创办该社第一本科幻杂志『ハヤカワ・SF・シリーズ』,这一举措被视为其在科幻文学领域的初次尝试和开拓性举措。1979年,科幻小说在日本出版遇冷,出版商纷纷破产,恰恰此时早川书房独具慧眼,转危机为契机,将科幻文学确立为出版社的特色与重点,密切关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日本本土和欧美的优秀科幻作品,出版了几乎所有星云奖最佳外国小说的获奖作品。经过40余年的发展,该社共出版科幻文学作品925部,占其出版书籍总数的1/4。其中将近九成(约800部)作品是翻译出版的海外科幻文学,而中国科幻作品仅有65部,远远低于英语类科幻文学在日本的译介总数。早川书房长期以来将科幻文学的译介重心置于英语国家的科幻作品上,在作品甄选、版权交涉、组织翻译、出版宣传等方面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众多作家通过早川书房赢得了国际声誉。

3.2 早川书房译介中国科幻文学的特征

欧美科幻在日本的引进时间早、持续周期长、社会受众度高。相比之下,早川书房译介中国科幻的时间虽短,但其作品初入日本即刻引发现象级翻译文学事件,在日本乃至世界科幻文坛掀起“中国科幻旋风”,具体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

其一,初入日本便经历了英文转译的世界文学旅程。2018年,早川书房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科幻短篇合集《北京折叠 现代中国科幻集》,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真正进入日本大众视野。该科幻集于2015年首先由刘宇昆编译成英文科幻集(*Invisible Planets*),收录了刘慈欣、郝景芳,以及新生代作家陈楸帆、夏笳等7位作家的13部科幻作品。在英译本的编译过程中,刘宇昆充分调动自身作为世界级名人译者、名人科幻作家的象征资本,使英译本实现文本价值的跃迁,具备了“强大的象征力与文本参照价值”(卢冬丽,2021:81)。早川书房组织译者根据英译本进行翻译出版,使得中国科幻初入日本大众视野之时,便已然经历了世界科幻文学的传播历程。2020年,第二部中国科幻文集《月光 现代中国科幻集》延续了这一模式,依照刘宇昆编译的英译本(*Broken Stars*)进行翻译出版。考虑到初探期日本读者对中国科幻相对陌生、中国作家国际认知度有限等问题,早川书房分别对刘宇昆拟定的英文书名进行调整:将 *Invisible Planets* 更名为『折りたたみ北京 現代中国 SFアンソロジー』(《北京折叠 现代中国科幻集》);将 *Broken Stars* 更名为『月の光 現代中国 SFアンソロジー』(《月光 现代中国科幻集》)。借助雨果奖得主郝景芳、刘慈欣的象征资本来提升中国科幻在日本的接受度。

其二,作品进入日本后,即刻引发中国科幻文学的旋风。早川书房从2019年开始译介“三体”系列,这一事件是中国科幻文学在日本传播的里程碑文学事件。泊功承担了“三体”系列第二部和第三部的汉日翻译工作,他在与笔者的对谈中表示:“在‘三体’之前,仅有林久之、立原透耶等中国文学研究者在一些期刊上发表过中国科幻短篇译作,日本国内并没有专门从事科幻文学的汉日译者。从这点来说,‘三体’的翻译是中国长篇科幻文学进入日本的先锋之举。”根据早川书房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4月,“三体”系列在日本的销量高达65万册。大森望盛赞:“能给读者带来如此震惊体验的,放眼世界也只有刘慈欣一人。”(大森望,2021:388)“三体”系列中,第一部和第三部分别摘获日本最佳科幻海外篇第一名,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摘获日本星云奖海外长篇小说奖,且这些奖项均是日本读者投票产生的,足见日本读者对“三体”系列的高度认可。

其三,多元化译介中国科幻及其他类型中国文学。继“三体”系列后,更多具有鲜明符号特征的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得到早川书房的译介,如陈楸帆的《荒潮》、郝景芳的《人之彼岸》、宝树的《时间之墟》和《三体×·观想之宙》、刘慈欣的《圆》以及《2000年代海外科幻杰作选》(『2000年代海外 SF 傑作選』)和《2010年代海外科幻

杰作选》(『2010年代海外SF傑作選』)两部中国科幻集。此外,郝景芳的《流浪苍穹》及刘慈欣的《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也经由早川书房译介出版,“中国科幻在日本的真正译介才刚刚开始”(大森望,2021:349)。除科幻文学外,早川书房还将译介范围拓展至中国推理文学等其他类型文学,如陆秋槎的《元年春之祭》、陈浩基的《第欧根尼变奏曲》等。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3月,早川书房出版了金宇澄创作的长篇小说《繁花》。作为一部描写“上海”的城市文学作品,“对于‘上海’这个在日本很有影响力的中国都市符号,日本读者无疑想要通过文学作品了解更多”(施晨露,2022)。虽然早川书房偏好译介经由英语圈读者验证的科幻、推理等通俗文学,但同时展现出对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和其他类型文学的关注,在题材选择方面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倾向。

4. 早川书房译介中国科幻的行动路径

迄今为止,早川书房译介中国科幻文学虽还不足10年,但其在日本引发了旋风,这不仅源于中国科幻“继承中国传统文学基因,同时又关注全球人类共同境遇,获得广泛共情”(许钧,2021),更得益于早川书房在翻译生产以及出版宣传行动中构建的译介行动网络——各方行动者以出版社为核心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中国科幻在日本的深度传播。

4.1 翻译再生产的行动路径

首先,在翻译选择方面,早川书房建立起面向中国科幻文学的筛选体系与选择基准,偏好选择历经世界文学旅程的中国科幻文学译介至日本文学体系。卡萨诺瓦认为,翻译作品的价值是由国际文学场域中3个极点的各自位置决定的,分别是:语言(源语语言与译语语言)、源语文本的作者以及译者。(Casanova, 2010: 290)出版社“需既从源语文学场域角度出发,优先遴选其作者在中国文学场域中拥有更多文化与象征资本或其本身已被‘祝圣’的作品,又从译语文学场域角度出发优先遴选西方英语国家文学场域需要或感兴趣的中国文学作品,而二者之间的相互参照和结合则是更理性的选择”(王洪涛,2021:41)。而早川书房对中国科幻文学的翻译价值认知和选择丰富了上述卡萨诺瓦的“3个极点”理论,既涉及中文源语场域的语言、作者,还涉及英语中介语场域以及最终日语场域的语言和译者。据笔者统计,早川书房已出版65部中国科幻作品,其中45部(约有七成)来源于刘宇昆的英译本。这一统计结果,与日本汉学家饭冢容“中国科幻文学约有八成是经由英语翻译成日语的,相较于汉日直译,英日转译的途径更容易被日本读者所接受”(岛田荣昭,2020)的观点基本一致。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日本译介的开端之作《北京折叠——现代中国科幻集》以及巅峰之作“三体”系列等,既保证了自身在中国源语

文学场域的文化与象征资本,又依托了中介英译者刘宇昆作为世界级科幻作家兼名人译者所具备的象征资本,即这些作品在英语文学场域已实现“祝圣”。早川书房选择经由英语世界完成文本旅行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正是考虑到初入日本的中国科幻文学在源语场域、中介语场域所累积的资本,通过促成这些资本的相互参照与融合,使作品得以被移植、转化并融入日本文学场域,经过日本本土科幻生态的发酵,最终“催发了日本社会象征性资本的叠加效应”(卢冬丽,2022:779)。

早川书房的翻译选择必然要求其积极吸纳具有高象征资本的英日译者、汉日译者“转入”译者群落。泊功在与笔者对谈中表示:“在日本,出版社基于译者的翻译业绩、专业实力和人品,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进而与译者签署协议。译著的质量以及销售情况直接影响出版社对译者的‘信任度’。”长期以来,早川书房大量译介英语世界的科幻文学,与专业的科幻文学英日译者建立了稳定的信任关系。《北京折叠 现代中国科幻集》和《月光 现代中国科幻集》的英日译者中原尚载、大谷真弓等,均具有丰富的英日科幻文学翻译经验,早川书房将这种与英日译者长期成功合作的“信任关系”模式延续到了中国科幻文学的译介工作中。然而,以“三体”系列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源于中国场域,其在日本译介生成过程中必然会与日本汉学家和翻译家产生关联。系列第一部的译介就是光吉樱和湾仔两位汉日译者“内驱动生成在先,出版社外驱动生成在后的复合性译介生成”(卢冬丽,2022:779)。汉日译者的主动翻译行为推动了早川书房与重庆出版社的版权签署,以及后续“三体”系列的译介生成。同时,早川书房清晰地认知到,译者的文化资本是翻译场域的核心要素,杰出译者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有助于提升译著的传播效率。汉学家立原透耶在中国科幻文学被日本读者广为熟知之前,曾向日本各大出版社、期刊杂志和读者大力推介中国科幻文学,凭借前期的这些努力,她与早川书房构建起“信任关系”,进而被吸纳至“三体”系列译者团队,负责第一部的监修与第二部的部分翻译工作。立原透耶本人也极为期待,在与笔者对谈中明确表示:“哪怕是一丁点儿,我也想参与‘三体’系列的翻译。”出于日本读者的强烈期待,为加快翻译出版的进程,出版社需要招募更多的汉日译者参与“三体”系列汉日初稿的翻译生产,经由立原透耶继而招募了泊功、上原香两位汉日译者。此外,早川书房长期组织翻译出版刘宇昆英语创作及翻译的科幻作品,积累了专业媒介资源,进而成功招募知名英日科幻文学专业译者大森望至译者行动网络中,并明确将打造“科幻文学”的终极目标,“转出”为大森望在翻译再生产过程中的行动准则。大森望表示“其实早在《三体》出版之前,就曾和山口晶就‘《三体》理想的日译本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大森望,2019:443),且“自己的最终任务是将(汉日)翻译原稿改写成当代科幻文学”(大森望,2019:439)。泊功也表示:“得知汉日初稿最终会由专业的科幻翻译家大森望进行校对、润色,反而安心了很多,原先对自己经验不足的担忧和顾虑也随之消散,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尽情翻译。”

由此,早川书房通过与译者建立“信任关系”,主动建构起英日译者和汉日译者的多译者行动者网络,实现译者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并采用汉日译者翻译初稿、英日译者根据英语中介译本对初稿进行“改写、再次翻译”的翻译模式。鉴于“三体”系列在日本引发的热烈反响,早川书房在出版宝树《三体×·观想之宙》等多部中国科幻文学时,继续沿用了这一译者合作模式。在这一翻译生产过程中,早川书房促成英日译者与汉日译者的相遇、协商与对话,尽管多译者间必然存在着翻译风格的博弈与冲突,但早川书房对译者充满信任,同时将“希望出版真正意义上的‘科幻文学’”这一核心理念“转出”为译者(尤其是负责最终校阅与修改的英日科幻译者大森望)的行为语言,最终实现多译者间的协调与对话。

4.2 翻译流通的行动路径

在“三体”系列引发中国科幻文学的旋风之前,尽管早川书房已通过英日转译推出部分中国当代科幻文集,但其受众多集中于关注欧美科幻文学的粉丝读者。以“三体”系列为开端,早川书房将各大书店、新闻传媒、专业人士等“转入”出版宣传、销售网络,形成网络行为者的合力,并将“提升日本文学场域中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读者群体”这一目的“转出”为行动者语言。

首先,借由知名人士“造势”。在“三体”系列正式出版之前,早川书房提前向日本社会知名人士发放译著“抢先版”,这些知名人士第一时间阅读后在 Twitter 等社交平台发表评论,客观上将早川书房预热市场和吸引大众读者的转译目的“转出”至日本大众层面,为即将上市的中国科幻文学“造势”。日本知名游戏设计师小岛秀夫在阅读“抢先版”后,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阅读体验,高度评价“本书引发的世界级热议也许会改变科幻小说的轨道”,这一评价引发日本读者的高度关注和媒体的大量报道。著名导演、漫画家新海诚也在个人 Twitter 中推荐“三体”,吸引众多粉丝关注“三体”系列的影视化改编进程。借由社会知名人士提前“造势”这一营销策略,早川书房成功激发日本读者的阅读期待。“三体”系列在亚马逊出售之前,便已经荣登最想购买的书籍销售排行榜首位。

其次,封面设计、海报宣传的系列化和特色化。早川书房“转入”日本知名封面设计师富安健一郎,推动其在鲜艳强烈的色彩中融入科幻元素。出版社编辑梅田麻里绘说道:“我们特别委托设计师,“三体”系列第一部是以红色为主调,第二部则要突出安静、深沉的气氛。”在出版社明确的“转出”目的指引下,设计师将其化为行动语言,在与第一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第二部以蓝绿色为主色调突出安静、深沉的氛围,第三部的封面则铺满了橙色的星球碎片。三部曲的封面设计形成了出版社与设计者的行为合力,既在红色、蓝绿色、橙色的强烈色彩中力图传递“三体”系列每一部所独有的世界观,又通过风格上的关联,突出其同属“三体宇宙”的属性,有效增强读者的阅读连贯性、购买黏性。

最后,媒体宣传进一步扩大多元受众。2019年7月《三体》发售之时,早川书房联合NHK电视台,在面向日本家庭主妇的专栏「すっぴん」中讲解何为“科幻小说”,既扩大女性读者群体,也力图将《三体》打造成日本民众了解“经济成长中急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窗口”。另外,早川书房在专业财经报纸《日本经济新闻》登出巨幅广告,以“现代中国最大的冲击”的宣传标语吸引中年商务人士读者。2020年6月《三体Ⅱ》发售之时,早川书房更是耗费1000万日元购买了《朝日新闻》大版面广告加强宣传,将《三体Ⅱ》定位为“现代通俗文学的最高峰”,趁着第一部的热销进一步扩大读者群。在传统书店图书营销层面,早川书房依托在出版业界积累的社会文化资本,积极招募淳久堂书店、茑屋书店、往来堂书店等图书实体店、分销商,以及图书电商亚马逊等加入营销网络。刘慈欣的“三体”系列、陈楸帆的《荒潮》等一经出版便登陆日本各大书店的新书推荐橱窗,在店内显眼位置设置图书展台,通过巨幅海报、造型美观的图书堆头直接吸引读者,同时售卖周边T恤等,保障图书的有效营销。此外,早川书房构建多元化发行渠道,线上线下平台同步销售,并在Twitter、Instagram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实时更新新书出版、销售的情况和周边活动,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图书宣传。

由此,早川书房采用有针对性的、多渠道的宣传销售策略,积极促使各行动者“转入”流通网络,通过传统与新媒体的结合,构建起高活跃度、强互动性的行动网络,最终达成有效宣传和营销的目的。

4.3 翻译批评的行动路径

任何系统的建构都必须基于明确的目标取向或者动机,构建翻译批评研究话语系统,旨在满足其区别于其他系统的独特诉求。(傅敬民等,2020:2)以早川书房为核心构建的行动网络,既有翻译再生产、翻译流通的显性行动网络,也有翻译批评话语系统的隐性行动网络。早川书房通过以译者重组为中心的翻译再生产、以书店媒体为中心的宣传流通网络,客观上塑造了中国科幻在日本译介生成的“磁力场”,使得中国科幻文学在日本具备了“自己运行规则的独立社会空间,能根据自身规律积累特定形式的资本,并依据特定形式的权力关系进行运作”(Bourdieu, 1993:164)。早川书房则位于这一权力关系的中心,通过强有力的“磁力场”隐性吸引专业评论家、学者、精英读者等行动者“转入”中国科幻的批评网络,共同构建中国科幻在日本的翻译批评话语体系。其中,专业评论家、社会人士、学者是中国科幻在日本的权威评判者,拥有雄厚的象征资本。日本科幻研究家日下三藏对刘慈欣科幻的世界文学地位给予了高度肯定:“《三体》这部作品,在日本相当于小松左京的长篇,在国外就像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会成为读者们无法忘却的标杆、新的科幻经典。”作家北原尚彦从文学创作视角做出评价:“全书充满奇思妙想,绝妙的构思接连不断、毫不吝啬地铺展开来,令人爱不释手。”更多的社会人士则从人

类、宇宙的视角给予评价,著名影评人及翻译家柳下毅一郎表示“以人类命运 400 年为赌注的欺骗游戏开始了”,Niantic 亚洲副社长川岛优志则评价《三体Ⅱ》是“远超第一部的宇宙级叙事”。

“三体”系列成为 21 世纪日本译介引进销量最大的科幻小说,将中国科幻的新鲜感扩大到了大众读者群。究其原因,中国科幻文学中中国叙事的“异质性”成为支撑中国科幻走向世界文学的重要因素。“‘三体’的故事构架中难免会有一些民族文化差异的产物,但其对中国社会的刻画与反映仍然具有压倒性的规模感和强烈的可读性,能让日本读者重温科幻小说的活力。”(大森望,2019)明治大学的加藤彻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读卖新闻》上发文称:“‘三体’是传统派的科幻小说,但同时也是亚洲式的,登场人物的感情波动的描写非常细腻而又真实。”如此,专业人士从中国叙事的“异质性”以及人类、宇宙、世界的共性的批评视角,客观上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科幻文学的“磁力”,隐性吸纳了更多元的读者群体,直接影响个体读者的购买和评价行为。而读者作为最终消费者和评判者,其消费和评判行为会再度影响其他读者的购买决策。在日本读书网站上,读者评价中国科幻文学的十大高频词汇为“有趣、翻译、精彩、享受、魅力、知识力、想象力、表现力、文明、宏大”(卢冬丽,2022:781—782),反衬出日本大众读者对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普遍认知。早川书房通过“磁力场”隐性构建的批评话语体系,与该社举办的一系列中日作家、译者、评论家的座谈会交互动,使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力辐射至日本社会,使其在日本打开自身边界,与海外行动者展开多元对话与交流,更推动其超越科幻文学本身的范畴,构建并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更为宏观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

5. 结语

日本科幻文学场域长期保持自我稳定,同时对海外的科幻文学展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科幻文学在日本译介生成,既受国际文学场域结构的影响,又受日本文学场域状况及运作规律的制约。以“三体”系列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世界文坛引发现象级翻译文学事件,是海外出版社、译者、专业评论人、精英读者等各行动者行为的共同作用。早川书房作为中国科幻在日本译介生成网络中的核心行动者,居于行动网络的中心,通过显性或隐性方式发挥核心作用,招募各行动者“转入”行动网络中,积极构建翻译再生产、翻译流通和翻译批评行动网络,形成强有力的中国科幻文学磁力场,同时将自身的文学目的、宣传目的、销售目的等“转出”为各行动者的语言,经由行为体的合力在流动的、开放的、动态的行动网络中推进中国科幻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生成。可以说,中国科幻文学在日本所引发的热潮是早川书房行动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早川书房“必然”引导中国科幻文学经由英语

世界绕道进入日本;另一方面,也“必然”引导英日译者与汉日译者相遇相知,各行动主体展开多元协商与对话。由此,早川书房作为联结并构建多行动者协调合作的核心行动者,译介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成为必然选择和结果,在日本形成相对稳定的营销流通和批评场域,实现中国科幻文学在日本语境下的合作共赢式译介生成,进而带动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日本的深度传播。早川书房成功译介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经验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商业出版模式提供了诸多参考。今后,以多模态形式提升中国科幻在海外的综合竞争力,以及围绕出版社等核心行为主体打造中国科幻的海外输出共同体等问题,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戴铮,2017.日本书市喜迎“石黑一雄特需”[N/OL].中华读书报,[10-11](2022-04-25).https://epaper.gmw.cn/zhdbsb/html/2017-10/11/nw.D110000zhdbsb_20171011_2-04.htm.
- 傅敬民,张红,2020.建构翻译批评研究话语系统何以可能?[J].上海翻译(2):1-6,94.
- 卢冬丽,2022.《三体》系列在日本的复合性译介生成[J].外语教学与研究,54(5):783-792,801.
- 卢冬丽,2021.转生、再生与共生: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英日转译的文本生命存续[J].外语与外语教学(6):80-89,149.
- 施晨露,2022.关西话翻译上海话是啥滋味?《繁花》日文版由《三体》日本出版方推出[EB/OL].[02-07](2022-04-25).<https://t.yinet.cn/baijia/32172411.html>.
- 汪宝荣,2020.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模式——以西方商业出版社为中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3(2):34-42,159.
- 许钧,2021.深耕文学翻译 增进文化交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纵横谈)[N].人民日报,04-13(020).
- 姚建彬,2018.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邢杰,黎壹平,张其帆,2019.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效用[J].中国翻译(5):28-36.
- 王洪涛,2021.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与传播的理论思考——社会翻译学的观察、主张与方略[J].中国翻译(6):38-45.
- BOURDIEU P,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M]. Cambridge:Polity Press.
- CASANOVA P, 2010. Consec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literary capital: Translation as unequal exchange [M]// Critical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Mona Baker(ed.).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85-303.

-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大森望. 2019. 訳者あとがき [M]//. 劉慈欣. 三体. 大森望, 光吉さくら, ワン・チャイ訳. 東京: 早川書房.
- 大森望, 2021. 訳者あとがき [M]//. 劉慈欣. 三体Ⅲ 死神長生. 大森望, ワンチャイ, 光吉さくら, 泊功訳. 東京: 早川書房.
- 島田栄昭, 2020. 累計 2000 万部超『三体』だけじゃない! 中国 SF 文学がなぜいま人気なのか【対談: 飯塚容氏の立原透耶氏】[EB/OL]. [07-08] (2022-07-25). <https://chuokoron.jp/culture/114390.html>

Inbound and Outbound Translation: The Action Path of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by Hayakawa Publishing

LU Dongli QIANG Yuming LU Yiping

Abstract: Hayakawa Publishing is a core actor in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in Japan. By analyzing its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publisher builds by means of capital interactions an action network for the translation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Japan through two primary pathways: “inbound” and “outbound” activities. Hayakawa Publishing actively “inbouded” English-Japanese science fiction translators into the translation production network,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ranslator sele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r collaboration models, and “outbouded” translation standards into the language of translator actors. On the other hand, Hayakawa Publishing “inbouded” actors such as bookstores and media into the promotional sales action network, creating a “magnetic field” that triggers concentrated attention of Japanese society o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hich recessively “inbouded” actors such as professional critics and elite readers into the translation criticism network, thereby constructing a critical discourse system for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Japan.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re role of publishers as actors in the generation of overseas literary translation,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core actors in the oversea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Hayakawa Publishing; translation; actors; network

作者简介:

卢冬丽,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教育学。

强宇铭,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法律。

卢一平,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学。